



## 假扮民主者的暴君

肯尼斯·罗斯

民主鲜未被如此推崇又如此践踏、如此提倡又如此无视、如此重要却又如此叫人失望。当今世界，民主已成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很少有政府愿被认为是不民主的。然而如此宣称者的信誉并没有跟上民主日渐普及的步伐。现在，即使是公开的独裁者也渴望被称为民主者。决心不让事实挡住道路，这些独裁领袖已掌握了一套民主修辞艺术，而这套民主辞令往往和他们实际的统治毫无干系。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这洋残酷的领袖为什么选择发起选举？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卡里莫夫领导的政府因政治和宗教的原因监禁了约 7000 人，常常折磨被囚禁者。最近在 2005 年，又在安集延杀害了数以百计的示威者。他根本不是民主者，在 2007 年 12 月的选举中，他没有真正的对手，因为没有人敢真的反对他的统治。即使宪法中反对三次连任七年总统的规定也没能阻碍他。

然而这个残酷的总统发现伪选举能使他的统治合法。还有其它这样的领袖：如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巴基斯坦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埃塞俄比亚的梅莱斯·泽纳维，和俄国的弗拉基米尔·普京。

甚至中国也加入了其中。在二零零七年十月的党代表大会上，胡景涛主席使用了民主这个词多达六十多次，号召党内更多的民主。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停止阻碍独立政党、阻止为维护基本权利的合法努力、关闭无数民间团体、媒体机构和网站。而且中国仍没有全国性的直接选

举。他想的是什么呢？共产党允许 221 个人竞争中央委员会的 204 个席位。

这些独裁者为控制民主烦人的不可预测性而用的技术有独特性。他们面临的挑战是既看起来像要拥抱民主原则，又要避免屈服于大众的喜悦。选举欺骗，政治暴力，新闻审查，对民间社团的压迫，甚至军事统治都被用来限制其所声称的民主化过程会导致政府中有广泛发言权的可能。

独裁者希望能成功使用这些花招的原因之一是，与人权不同，民主没有法定定义。民主的概念反映了选择和指引一个政府的最好的方式是把最终权力赋予被统治的人民。它远远不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制度，它的危险是多数主义者对少数派的不在乎，强大因素易对其有太多影响。可是作为在丘吉尔口中著称的“最不坏”的政府，民主政府是人权理想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没有民主国际大会，也没有广泛签署的条约来规定一个政府怎样表现才能称为民主。民主的真正意义，各人看法都不尽相同。

与此对照，国际人权法赋予所有公民权利以“直接地或通过自由选择代表来参与公共事务，”和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投票”，用“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和“秘密投票”以“确保选民自由表达意愿”。它也给与了一系列对强的有意义的民主很重要的相关权利，包括保护多样化和有力的民间社会的权利，保护自由活跃的新闻的权利，保护少数派利益的权利，确保政府官员守法的权利。具体性和法律约束力是它们的强大力量。但当独裁者试着用假扮民主者来转移对他们违反人权的批评时，当他们能不尊重基本人权就享受被称为民主者的好处，对人权的全球捍卫就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使用一点花招，暴君就可以被认为是“民主者”，为什么还要遵守一套强制性的国际人权法呢？

对民主之名的滥用并不新鲜。曾经出现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已不存在的一党制东德共产国家）或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朝鲜不可能的官方名称）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很少有人相信这些奥威尔式的声称。今天的独裁者很容易打出民主的旗号，这是令人难过的现实。

伪民主领袖在他们国家并没有很大合法性。当地人口很快知道选举实际是闹剧。在最好的情况下，领袖得到假装遵守地方选举法的益处。事实上，民主外衣之下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不管多无意义的选举活动对最强硬的独裁者都有益处，这已有国际合法性。由于其它的利益——能源，商业，反恐——世界基础较巩固的民主国家常常轻易相信这些假民主者。

最重要的是在总统乔治·布什执政下的美国。类似世界上其它令人不安的虐待性的政府，美国政府把宣传民主做为捍卫人权的更柔和的模糊的替代。美国的民主还是较好的，但布什当局在人权问题上很令人不安。人权谈话涉及关塔那摩，中情局秘密监狱，水刑，投降，军事委员会，人身保护。尽管有 2000 年的总统选举，对民主的讨论却毫无障碍地开展着。

缺乏切实有效的民主国际标准使独裁者相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仅靠选举这一行为就可得到民主标签。布什对（时任将军的）穆沙拉夫 2007 年十一月宣布“紧急统治”的反应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穆沙拉夫监禁数以千计的政治反对者后，布什却声称穆沙拉夫没有“越过界限。” 布什无法鼓吹穆沙拉夫的人权记录，所以他宣布穆沙拉夫是“相信民主的人”，而巴基斯坦正在“通向民主的路上”。但是“通向民主的路”允许关押反对党、不接受独立法官、封杀独立新闻。所以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世上的暴君也认为他们可以是民主者。无价值的声称者例如埃及，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的领袖称自

己为民主者而遭到很少国际反对，民主的概念变得廉价，而它的人权成份被抛在一边。

更糟的是，布什当局为使入侵伊拉克合理化，美其名曰“民主促进”。如此一来，独裁者更容易把施向他们的压力等同于帝国主义军事化的强制民主进程。令人难过的是，这种愤世嫉俗式的伎俩常常奏效，因为今日世界的大多数人倾向于把任何华盛顿领导的民主运动看作是军事入侵或政变的借口，要不就是制造混乱的方法。独裁者学到了，援引伊拉克的事例是弱化民主压力的有效办法。而那些可能能够护卫更有力民主的政府却不愿意去努力，只因怕被看作加入了布什的议程。

其他政府也把无效选举做为重新开始独裁的借口——这种独裁应得到谴责而不是合作。一个主要例子是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对哈萨克斯坦的处理：此组织由 56 个政府组成，分别来自欧洲，中亚，美国和加拿大。2007 年八月总统那苏坦·纳札巴耶夫发起议会选举，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发现多达百分之四十的投票站有计票错误。可以预测的结果：纳札巴耶夫的党赢了下议会的所有席位，声称得到百分之八十八的选票，没有反对党得到议会代表所需的最低百分之七的选票。这个骗局的背后是持续的对人权的违反：政府忠诚份子控制广播媒体，独立新闻工作者由于批评总统或政府而遭到威胁和骚扰，诽谤性文字被当作罪行，反对份子面临监禁危险，例如阿里贝克·朱巴维，目前他因污辱纳札巴耶夫而服五年徒刑。

然而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无视证据，声称选举“使哈萨克斯坦向民主前进。”这个愿望性的观点显然是为了避免阻止哈萨克斯坦实现其长期目标：成为第一个做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主席的前苏联共和国。专注于能源问题的德国站在了俄国一边，支持这个不合适的候选人。固然美国和英国领导着反对派，最后他们也放弃了。2007 年十一月，欧洲

安全和合作组织表明一致允许哈萨克斯坦担任 2010 年的主席。哈萨克斯坦并没有对代表着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核心的民主和人权标准表示敬意，它仅仅宣誓要进行媒体和选举改革，停止破坏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的人权法令。以这种形式贬低民主，而没有受到本该担任民主卫士的政府的反对，使得纳札巴耶夫式的专制领袖很容易假扮为民主者，从而转移进行更有意义的人权改革的压力。

当然，是否坚持真正的民主并不是对国际社会人权承诺的唯一考验。最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对发生在乍得，东刚果，艾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伊拉克，索马里，斯里兰卡，和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暴行的反应，和对发生在封闭的社会，或是缅甸，中国，古巴，厄立特里亚，利比亚，朝鲜，沙特阿拉伯和越南这些国家的严重压迫的反应。本篇文章对这些紧急局势有详细讨论。但人权事务不应仅仅关注这些严重的例子，它也应关注其它一些政府——这些政府可能表现得更开明，却仍使用压迫手段防止对其的挑战。当使用民主姿态就可以代替对人权全副盔甲的尊重时，它们的任务就变轻松了。

为避免这个骗局，防止“民主”被用做更严格的权利标准的粗劣代替，我们需要紧急纠正民主理想的完整意义。这并不意味着提倡狭隘的统治方式。合法的民主有多种多样：包括成比例的代表系统，简单多数票当选模型，那些以强势总统为特色的，和以强势首相为中心的，和把权力主要托付于行政部门的，还有那些偏向较强的立法机关的。但所有有价值的民主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包括自由举行的、透明的、有明晰计划的周期性竞争选举、有意义的政党序列、独立媒体、以及能够赋予公民——包括少数民族——广泛机会联合起来大声呼吁的民间社团组织。还有无人——特别是政府官员——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司法系统。

2007年，民主在所有拥有正常权利交替，且反对党能在自由公正的选举后执政的国家继续表现出活力。例如塞拉利昂，牙买加，波兰，和澳大利亚。在土耳其，军队发起了所谓的电子邮件行动以图封杀民主选举出来的温和派伊斯兰教的政府任命它的官员阿卜杜拉·居尔做总统。为避免军方的阻挠，政府提前进行了选举，此指令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居尔仍得到任命。可见土耳其人民要求民主的愿望很强烈。

然而，很多独裁者急于使自己合法化。如果他们能成功制造假选举，他们就会这么做。独裁者是否得以这样做，取决于基础较巩固的民主国家是否谨慎地坚持民主必须照顾到方方面面——包括对广泛人权和法制的尊重。有原则的民主承诺不容易。它可能意味着对独裁者朋友施压和促进即使是基础较巩固的民主国家也不愿意强调的权利。但如果民主促进要做为尊重人权的压力来源，而不是做为为了赞成感觉良好的，空洞的选择而绕过国际标准的新工具，有原则的民主承诺是必要的。

民主常有被操纵的危险，被当做虚假的欺骗性的替代物，再获得作为人权中心的强有力的民主理想就需要提高对贬低者的聪明诡计的注意。以下是对最近一些趋势的总结：政府破坏人权颠覆民主，或用鼓吹民主来避免讨论人权。

维护民主还要求避免一些易犯的错误，而正是这些错误，使得近来许多捍卫民主的努力沦为空谈。。如上所述，许多基础较巩固的民主国家更倾向于依靠“民主者”而不是民主原则，接受错误的二分法：对所知暴君的唯一其它选择是所怕的暴君，声称民主即使和给予它意义的人权分离也能繁荣，根据假民主者的战略价值而调整对真正民主的要求。如果民主促进要成为捍卫人权的积极力量，就必须抵制这些趋势。

## 文字游戏

极权领袖对民主含糊其词的使用总是始于文字游戏或熟练的修辞手法，暗示削弱民主的限制手段对拯救民主是必要的。例如，在巴基斯坦，穆沙拉夫强制进行“紧急统治”以阻止当时独立的最高法院并把他的当选总统定为非法，当时他是军事首脑。尽管有非常私人的动机，他声称为了“维持民主过渡”，这个出乎意料的行动是必要的。类似地，在孟加拉国，一个军队任命的临时代理的政府取缔了所有的政治和工会活动，限制新闻自由，名义是为了准备可信的全国选举。

很多压制的领袖试着重新定义民主，他们每每在民主之前使用一个破坏性的修饰词或一个对立的形容词。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用关闭俄国所有的对抗力量中心来削弱民主，他已成为“有主权的民主”的提议者，实际上这意味着民主的意思由统治者决定。当缅甸的执政团驱赶游行的僧人并暴力镇压异议，它声言这是“遵守纪律的民主”的需要。中国长期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它的意思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排除少数党的中央集权制。

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把“紧急统治”辩解为“真正民主”，解释说：“我们要民主，我们要人权，我们要公民自由，但我们有自己做事的方式。”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用“参与式民主”来辩解废除独立政党，说人民不需要它们做中介，因为它直接通过政府组织的集会直接参与统治。同样的概念还有古巴版，候选人必须被政府控制的大型组织提前批准，宪法对除共产党之外的其它政党有严格限制。

## 选举骗局

普通的选举骗局是回避民主的不确定性的最常见手段。除了以上哈萨克斯坦的例子，最新的例证还包括尼日利亚和乍得。

在尼日利亚，面临着自 1960 年国家独立后第一次从一个平民领袖到另一个平民领袖的权力转移，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党用大的骗局来确保它的候选人奥马鲁·亚拉杜瓦通过 2007 年四月的选举，接替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当总统。值得赞许的是，为挽回一些合法性，亚拉杜瓦进行了选举改革，允许法庭推翻他的政党的一些虚假的国家级胜利，对自己备受非议的选举继续接受司法审查。但没有人因他“选举”中核心部分明显的一票多投、买选票、政治恐吓而遭到起诉，所以尼日利亚人民对他能否将改革主义者的言语变为新的民主现实正在失去信心。

在乍得，1990 年得到权力的总统伊德里斯·代比通过举行三个虚假选举给自己的统治赋予“民主”认可。2005 年，他推翻了一项禁止他拥有第三次五年任期的法律条文，他通过不正规的公民投票变更宪法。预料到骗局的反对党拒绝提供 2006 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使得代比轻易地战胜四个较弱对手，包括两个政府部长。美国和欧盟拒绝派遣观察员，使这次投票表决被低参加率、不够年龄选举和多次选举糟塌。

## 控制选举机器

公平选举取决于参与者的独立性，所以统治者操纵选举最爱用的方式是指使众多支持者操控选举机器，这并不令人吃惊。在阿塞拜疆，选举骗局是个持续的问题，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所属的执政党任命主席并在选举委员会中占多数。在津巴布韦，反对党不包括在选举委员会内。在泰国，由新的军队支持的宪法允许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由参议院选择，它曾经是由选举产生的但现在是由任命的。

马来西亚的例子表明政府为什么要尽力控制选举机器。由政府控制的选举委员会拒绝了反对派所提出的除去名单上有名无实的选民而做的努力，和为减少政府人员广泛使用的缺席选举人票做的努力，和为允许所有政党能接触到国家控制的媒体做的努力。类似地，柬埔寨的选



举由国家选举委员会上演，它是由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控制，它忽略独立监督者或反对派指出的暴力，骗局或恐吓问题。

因为这些失败，国家选举监督机构经常得到国际机构的补充。但这也被试图管理选举的人攻击。克里姆林宫有效地阻止了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的主要选举监督机构，民主机构和人权办公室的观察员对 2007 年十二月俄国议会选举的审查，克里姆林拖延观察员的签证，限制所许可的国际观察员的数量，并威胁要阻止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对其进行评估，直到俄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已影响了公众对投票的感受后很久。

### 阻碍和打击反对派候选人

一个很明显的修改选举的办法是阻止反对派候选人参选。伊朗使这个办法臻于完美，它的监护委员会拒绝了 2004 年议会选举的约半数候选人，它认为其中大部分人明显地有心改革。在古巴，共产党控制的国家议会有权拒绝任何预期的候选人得到公职。突尼斯拒绝使大部分的反对派合法化。在泰国，军事政府的选举委员会用严厉的新规定，如果在示威运动中播放音乐，或者用不符合规定尺寸的海报，候选人就会因这些小的过错失去资格，它的明显目的是排除被驱逐的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泰爱泰党的后继者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

更具惩罚性的措施在另一些情形中被使用。2005 年，在举行 26 年以来乌干达第一次多党议会和总统选举前数月，政府监禁了反对派领导人总统竞争对手基萨·贝西杰，罪名是叛国罪和强奸罪。他后来被释放，但监禁严重地损害了他在几个月后参加选举的能力，所以他输给了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在津巴布韦，2007 年三月，政府对将是竞争对手的人发送类似的信号：派警察严重殴打反对派领袖摩根·斯瓦及瑞和其他一些反对派领导人。

2006年十二月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死后，土库曼斯坦终于得到真正的机会。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统治了国家 21 年，毁坏了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尼亚佐夫的继承人，按宪法规定应做过渡期总统的议会主席却被监禁，罪名是迫使一个亲戚自杀，这为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夺权铺路。五名低级“其他”候选人，全代表国家的唯一政党，没能胜过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没有一个反对派领袖被允许从流放地回国做候选人。

有时，反对派候选人被许可竞选但后来因此得到惩处，这使以后的候选人泄气。在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指示下，政府囚禁了两个在 2006 年三月总统选举中挑战他的反对派候选人。其中一人在服五年半徒刑，罪名是“流氓罪”。

同样地，在 2005 年，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还面临美国政府民主化压力时，他允许其他候选人与他竞争。艾曼·努尔，他精力充沛和最受欢迎的对手，赢得了正式表决的 7%。但为保证努尔的候选资格不会鼓励更强大的未来挑战者，埃及政府不公平地审讯他，定罪为有政治动机的伪造罪，判他五年监禁。

在 2005 年，埃及最大的反对集团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出色，之后政府囚禁了它的一千多个成员，有些人被囚禁八个月之久。政府禁止有宗教基础的政治活动，排除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合法政党的可能性。政府还讨论禁止候选人以独立派人士身份参加选举，而穆斯林兄弟会一直以独立派人士身份参加选举。

以色列使这种行为更进一步——甚至在候选人选举得胜后囚禁他们。由于对哈马斯在 2006 年议会选举中得胜感到沮丧，以色列逮捕哈马斯议员，使该政党在议会中不能获得法定人数。

## 政治暴力

暴力是驯服民主的常用工具。在黎巴嫩，来历不明的攻击者刺杀了议会多数党的一系列人物，议会多数党和叙利亚及其在黎巴嫩的同盟有持续的政治斗争。在车臣，由克里姆林宫任命的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用叫做“卡迪拉乌斯”的警卫部队来野蛮地加强统治。柬埔寨的洪森，自 1985 年任首相，在一次次选举中用暴力来覆盖异议，包括多次刺杀反对党成员，独立新闻记者，人权护卫者，和工会领袖。埃塞俄比亚当局在 2005 年的选举中得胜，它这样对待意外的反对势力：暴力驱散和平示威者，监禁大部分反对派领袖。

在津巴布韦，总统和议会选举定在 2008 年三月，政府用青年民兵和“退伍军人”殴打，折磨和强奸反对派人物，警察用过分的力量，有时是致命的，来解散反对派示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2007 年一月二月期间，士兵和警察用过分的力量，在镇压反选举腐败，有时有暴力性的抗议期间，杀死了一百多平民。在尼日利亚，在 2007 年四月的选举之前，统治党招收类似歹徒的信徒来抑制反对派。在埃及 2005 年的议会选举中，返回的民意测验显示和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系的候选人数目增加且赢得席位，于是埃及保安部队亲自阻止选民到穆斯林兄弟会中心地的投票站，接着的暴力使 11 个想要选举的人死亡。

## 遏止媒体声音

有意义的选举要求新闻自由——来强调政府须注意的问题，亦使公众能看到候选人对抗性的观点。媒体对表达必要的选举间歇期民众的忧虑也很重要，因为每隔几年的一张单独选票是简陋不足的表达民众忧虑的方法。

俄国总统普金的第一个目标是独立媒体。今天，主要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新闻都在克里姆林拥护者手中。受控的媒体是普金确保反对

派没有机会威胁他的政治支配的一个重要工具，不论是在 2007 年 12 月的议会选举或是计划在 2008 年三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任意地使用一个规章性过程，拒绝继续 RCTV 的执照，RCTV 是国家四个主要的私有电视台，是唯一有全国报道范围的敢于有反查韦斯社论的电视台。津巴布韦压迫性的媒体法使唯一的独立新闻日报，每日新闻，在 2003 年被关闭。

埃及监禁新闻工作者和博客作者，因为他们批评穆巴拉克，“伤害国家的尊严，”和出版“假的新闻…可能会扰乱公共秩序。”阿塞拜疆以一系列捏造的罪名监禁了至少十名新闻记者，以防止对总统阿利耶夫和其政府的批评。它还关闭主要的独立报纸。哈萨克斯坦关闭总统已疏远的女婿（现是总统政治对手）所拥有的一家电视台和新闻周报。像阿塞拜疆一样，它用诽谤法，以“污辱总统荣誉和尊严”罪名监禁了批评家。在哈萨克斯坦，自 2002 年以来，至少六名新闻记者在令人怀疑的“事故”中丧生。

## 阻止反对派集会

候选人向支持者讲话和表明政治力量的一个方式是组织公众集会。然而由于大的反对派集会能够表明政府所声称的广泛支持是空虚的，这些示威成为另一个最喜爱的攻击目标。

比如，马来西亚禁止超过五人以上没有许可证的公共集会，警察用加入化学品的水和催泪弹驱散有秩序的和平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在 2008 年早期的选举前进行选举改革。在俄国，当局殴打，囚禁，搔扰和平政治抗议者，包括前国际象棋冠军，目前的反对派领袖加里·卡斯帕罗夫（2007 年十一月）。

在津巴布韦，2007年二月，暴力警察破坏政治集会，向反对派支持者发射催泪弹，在对首都哈拉雷强加三个月的禁止政治集会和示威的命令前，在哈拉雷和布拉瓦约市逮捕了70多人。有关当局还暴力解散在埃及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集会。

## 关闭民间社团

除政党之外，充满活力的民主要求多样化的协会和组织，以便人们能动员对民主政策的支持，并能大声疾呼。这些民间社组织因而是独裁者的另一个共同的攻击目标。

例如，在俄国，一条2006年管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成为增长的骚扰的借口。法律要求组织递交关于他们活动的年终报告和对外国资金的使用，目的是清盘 - 已使用过的制裁。同时，组织受到强迫检查，2007年一条法律允许任何政治动机或思想动机的罪行被定为“极端的”，还会受苛刻的处罚，这使人担心此法将用于消除异议。

在土库曼斯坦，对非政府组织的严厉法律限制包括需要向政府登记每个拨款，每次会议都需通知政府，并且允许一名政府代表参与。自2003年以来，有三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登记了，只有一个与人权或公众责任有关。在乌兹别克斯坦，自从2005年的安集延大屠杀后，至少17个人权护卫者因政治罪名遭到监禁，几十人必须停止他们的人权工作逃离国家，还有许多国际组织被排除出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禁止多数的民间社团组织，2007年八月，巴勒斯坦当局宣布它将关闭103个民间社团组织，根据各种原则原因。

在那些重要非政府组织的国内领袖不惮于激怒政府的国家，对外来资金的限制是有组织的独立声音的严重障碍。埃及关闭了一个积极反对折磨的人权组织，原因是几年前就提过的声称其未经政府允许使用外国捐款。约旦和巴林提出了相似的立法：使用海外资金需要政府允许。伊朗和叙利亚已经实行这个要求，对民间社团的每日操作进行控

制。突尼斯政府阻拦欧盟为突尼斯人权同盟和其他独立组织提供拨款。

## 破坏法律原则

以上所提到的压迫和操纵是非法的。使用它的政府因此必须避免独立法律监督。有时，这是通过殴打和逮捕律师来实现的，例如在津巴布韦或中国。其他时候它通过大赦来实现。例如，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泰国的军事统治者，通过宪法改动使他们各自的突然行动不受惩罚。穆沙拉夫还遣散了威胁推翻他总统合法性的最高法院法官，用及时拥护他的忠诚的人替换。

## 微弱的国际反应

为使民主显得不重要而使用的这些伎俩并不是在政治真空中发生。虐待性的政府可能想便宜地使统治合法化，但这需要它们同侪的许可。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不够格的民主者能够成功地装作真民主者，是因为基础较巩固的民主国家对它们期望减少。

问题之一是利益的冲突。那些本应成为更有意义的民主的保护者因关心商业机会，资源或反恐的要求而忽略对一个政府民主资格的关心。然而，部分问题是伪善避免。即使是表面强盛的民主也发现接受构成真正民主的所有权利是不便的，除非这会导致对他们自己的侵害。

这个问题由于长久的在促进民主上的不一致而变得复杂。例如，现今美国政府对民主缺点的积极批评主要倾向于长期敌人或被社会遗弃者，如叙利亚、缅甸或古巴。华盛顿主要豁免了例如沙特阿拉伯、突尼斯或埃塞俄比亚的盟友，而对其它国的短期压力，例如埃及或约旦减少了。的确，尽管他们有压抑行为，美国政府常是这些联盟政府的主要资助者。这明显的双重标准使促进民主像政治便利行动，而不是对原则的承诺，减弱了真正民主改变的压力。

埃塞俄比亚是这种双重标准的受益者例证。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的政府拘捕了数以千计的抗议 2005 年选举欺骗的示威者，指控 18 位新闻工作者谋反。这些拘捕是更宽广压迫样式的一部分，包括折磨，拘留和对被视为政治对手的人的恐吓，在欧加登地区镇压叛乱和在邻国索马里与伊斯兰教力量战斗中的极度残酷。美国政府表达了对选举后镇压的沮丧，但埃塞俄比亚，一个关键的反恐伙伴，仍是华盛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的援助受益人。

埃塞俄比亚也是欧盟援助的主要非洲接收者之一。在 2005 年竞选暴力后，欧盟与世界银行和英国一起，暂停了他们对埃塞俄比亚的部分直接预算支持，但英国之后增加了它的援助。

约旦也受益于减小的民主期望，很大原因是美国政府恐惧此国的伊斯兰教徒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疆土上也许会复制哈姆斯的胜利，而且华盛顿明显感谢约旦通过提供秘密拘留中心来协助反恐行动，在这些拘留中心美国交付的嫌疑犯可能被拷打。2007 年七月约旦的市政选举据报道有严重欺骗，包括战士被公车运送到反对派中心地投票支持政府，一票多投，和被操纵的选民名单。然而美国大使和国会却祝贺约旦人使用他们的民主权利。据声称 11 月的议会选举中复制了一些欺骗，但美国国务院“称赞”约旦政府“在国家政治发展的道路上保证另一步又迈出了。”国务院特别称赞了对“独立全国观察员的”使用，却没注意到，政府背信它的诺言，不允许他们进入投票所，迫使他们从外面观察投票过程。

欧盟对约旦竞选的反应不是更有原则性。它没有发布已知的公开抗议，即使约旦，作为欧洲地区政策的成员，与欧共体签署了一个协会合约，其中对民主原则和根本人权的尊敬应该构成其“重要元素”。这失败反映出更大的欧洲地区政策的问题，因为不同于加入欧盟所需的成功的哥

本哈根标准，它没有标准或活动时间表，并且它越来越集中于例如边界管理和迁移控制的合作问题。

这样没有原则的认可暗示着只要“胜利者”是战略或商业同盟，华盛顿和欧盟常常会接受他的选举。选票的公正性和运动条件的公开性与伪装民主者的政治倾向性相比并不重要。

### **伪二分法：你所知道的独裁者或你惧怕的独裁者**

对民主操纵的微弱的国际反应的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独裁者会被更坏的人或事代替。以 1991 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的议会胜利开始，政治伊斯兰教的上升使恐惧变得更严重。精明的独裁者学会使用不是我就是他们的逻辑来为继续统治辩解，但这二分法经常是假的。

例如，西方世界担心伊斯兰教派将在一国任何公平的竞选中得胜，埃及的穆巴拉克因此得利。作为证据，穆巴拉克可能指出在 2005 年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候选人夺取了他们要争取的大多数席位。毫无疑问穆斯林兄弟会是真正受欢迎的，但这欢迎是选择有限的产品。在三十年里，埃及政府拒绝登记超过 60 个政党，只接受两个，其中之一它后来暂停。其中许多党可能成为一个世俗的反对派的召集点。

以上提到的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一个政党也被禁止，但它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不腐败的名誉来获得支持者。因此，今天，如果埃及人寻找穆巴拉克和其所在的执政的国家民主党的代替，穆斯林兄弟会看来是唯一的好选择。这对穆巴拉克是有益的，因为西方对他的选举操纵的默认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假的政治选择。美国为民主化加的压力主要以 2005 年穆斯林兄弟会的强劲表现结束。



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是类似的例子。他辩解说“紧急统治”是代替阿尔凯达和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统治的唯一的选项。西方接受和拥护穆沙拉夫对政治的操纵，称其为一种“适度”形式和“民主”路上的一步。它没注意到：巴基斯坦历史上投票都是支持温和派的政党（他们经常是腐败无能的），伊斯兰政党在竞争的全国大选中从未获得超过11%的选票，穆沙拉夫对适度中心的攻击迫使他与伊斯兰政党联盟，并且因此巩固了伊斯兰政党，在军事政府下缺乏平安政治变动的机会是强有力的吸收伊斯兰政党的力量。

布什政府对穆沙拉夫宣布紧急情况的不一致反应是例证。一方面，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飞到伊斯兰堡请穆沙拉夫结束紧急统治，释放被扣留的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他甚至适当地说，“紧急统治与自由，公平，可信的选举不相容。”甚至布什也敦促穆沙拉夫“脱掉你的制服。”

但在此文写作时，美国政府从未请求穆沙拉夫恢复被他遣散了的独立最高法院法官的原职，穆沙拉夫倾向于当他还是军事首领时，帮助他选为总统的那些易受影响的盟友。华盛顿也没有暂停它的大型军事协助。这所传送的信息是，为了不影响反恐盟友的任期，华盛顿宁愿让民主和法制分离。华盛顿似乎也想阻止法庭继续释放被国内情报局监禁的嫌疑犯，国内情报局是一个美国也曾使用过的监禁和审问服务。

对上升的伊斯兰教战斗性的恐惧似乎也是对孟加拉国混杂的国际反应原因之一。起初，国际社会促进的是更有原则性的民主。联合国和欧盟发现计划在2007年1月的选举太妥协，因此没理由派观察员，因而造成他们的延后。然而，临时代理的表面上保证自由公平的选举的政府宣称“紧急状态”并且成为事实上军事统治的工具，主持很大数量的任意拘捕，折磨案件，不受惩罚的安全部队进行保管杀害。美国，英国和印度政府表达了对缓慢竞选准备的担忧，却不担忧这个国家恶

劣的人权纪录。他们也没有呼吁军队把权力完全交给一个平民政府。然而，欧盟比它们坦率，并为统治和人权提供经济援助。

这样独裁统治的合谋有时被这些傲慢的主张合理化：人民 - 经常是穆斯林，更频繁地是阿拉伯人，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如果给他们别处人民都向往的同样的自由和自治权，在这些社会的风险太大。也就是说，西方政府有时抱怨没有值得援助的反对派。但那所谓的缺乏准备，缺乏政治选择，是被歪曲的政治状态，而且在西方默认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已把它们遗留。假民主者的压制是为了阻碍有效反对派的诞生。的确，以沙特阿拉伯为例，缺乏准备是政府用来避免选举的借口。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也用类似的借口，指责西方有“对你们经过几个世纪逐步形成的民主形式，人权和公民自由有不实际的执意...，但你要我们在几个月内采用它们....这是不可能的”。

拒绝那个逻辑并不是建议立即的，自由的选举是答案。正如极端主义在一个拘束的政治环境里繁荣，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突然选举也可能流行。一个更复杂的反应是必要的，此反应能使独裁者在选举前允许一系列的政治选择，与投票相比，更应尊重一系列的重要政治权利。民主促进者应该为变换政治前景努力，以便选民在投票前有一系列有意义的政治选择，而不是接受独裁者的选择为唯一选择。真正的选择是极端主义的敌人。

### **依靠“民主者”而不是民主原则**

另一个常见过失是：支持某个宣称的民主者，而不支持使民主有意义的人权原则。有基础的民主似乎在逐渐地寻找个人而不是机构来防止不幸，希望人民会把爱用民主修辞的领导统治和民主到达划等号，即使民主理论的第一课是无限的力量会趋向暴政。这个过失无疑在西方对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的政策中表现出来，但它也在对俄国、尼日利亚和格鲁吉亚的反应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1年布什在“注视他的眼睛看到他的灵魂”后，闻名于世地地拥抱普金。普金开始系统地削弱几乎俄国所有抵触的影响力中心——杜马、地方州长、新闻和非政府组织，甚而寡头政治家。美国政府最后做出反应，但它失去了一个更早的把美俄关系建立在原则上而不是个人感情上的机会。

德国传统上是影响欧盟对俄国政策的中坚力量，2007年它有一个混杂的纪录。德国大臣安格拉·默克尔，或许因为她在受苏联支配的东方长大，比她的重商主义者前辈，格哈特·施罗德更清楚地看普金。她多次谈到俄国令人烦扰的趋势，在她2006年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提出参观人权非政府组织。这令人期望德国将在2007年前半年，亦即它担任欧盟总统期间提高人权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人权继续让步给低级磋商。默克尔在2007年5月欧盟-俄国会议期间提到人权，然而在葡萄牙政府控制之下的下一届欧盟主席将默克尔对人权的关注与“说教”等同，破坏了她的努力。

美国和英国政府以及欧盟对2007年4月尼日利亚的总统和议会选举的大胆欺骗很坦率，但这些西方政府似乎热切地想与总统亚拉杜瓦合作，只因他的外交辞令是指向改革的——虽然他的选举比他安抚性的话语更具说服力。亚拉杜瓦也没有根据改革的承诺而起诉应对欺骗和政治暴力负责的人。这个事例所传达的信息似乎是，只要领导人对西方友好，伪选举亦将足够使他的统治合法。

在格鲁吉亚，2003年的玫瑰革命带来对民主原则有强壮承诺的政府和一个充满活力的民间社团。但此后它有严重的人权问题，特别是其刑法系统。然而国际组织和政府，特别是美国，抵制强烈批评，想要相信一个接受过西部教育的盟友，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总统的好意图。当2007年十一月格鲁吉亚政府猛烈镇压抗议者并强加9天的国家紧急状态时，拥抱人而不是民主原则的危险性变得明显。

如上提到的，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也被这个把民主降低到偏爱的个人的趋势控制。除接受穆沙拉夫为做总统而对最高法院的解雇之外，布什政府用极大的能量和穆沙拉夫及它喜爱的总理候选人，前总理贝·布托谈判，为她从流放地回巴基斯坦铺平道路。但在9月，当穆沙拉夫政府阻拦她的首要平民竞争者，被放逐的前总理纳瓦兹沙里夫回国的最初尝试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这完全是巴基斯坦的问题”。

## 辜负土耳其

土耳其可能是欧盟对民主和人权承诺的最重要考验。原则上，欧盟承诺接受土耳其作为成员国 -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 如果安卡拉达到民主和人权的哥本哈根标准。但主要的欧洲领导人，特别是德国法官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反对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随着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可能性变得遥远，欧盟丢失了杠杆作用，并且使土耳其那些把加入欧盟作为改革的一个原因的人的影响减小。不令人吃惊，军事又开始介入政府事务，发起以上提到的电子邮件行动，尝试阻拦命名阿卜杜拉·居尔作为总统。平民政府成功地引开此次行动，这多归功于土耳其人民的坚持，而不是欧盟对民主的，尊敬权利的土耳其的退色的诺言。

## 结论

即使独裁者也渐渐相信民主资格是通往合法统治的道路，这是希望的标志。广泛分享和深深为人所感知的价值观能够保证主权属于一个国家的人民，并且治理国家的权利最终是他们的。但这个过程是脆弱的，它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世界上有巩固基础的民主的承诺。如果他们接受任何伪装选举的独裁者，如果他们允许对民主的承诺由于对资源、商业机会和缺乏远见的安全感的追求而减弱，他们将贬低民主的价值。并且，如果独裁者能称自己是“民主人士”，他们就获得

了偏转维护人权压力的一个强有力工具。现在是停止贱卖民主，并用一个包括所有人权的更宽广，更有意义的概念代替它的时候。

## 这篇报道

这篇报道是人权观察第十八次对全球人权问题的年度回顾。它总结了超过世界七十五个国家的关键人权问题，讨论直到 2007 年十一月的事件。

每个国家条目讨论了主要人权问题，调查了地方人权护卫者开展工作的自由性，审视了主要国际力量的反应，例如联合国，欧盟，日本，美国，以及许多地区和国际组织/机构。

这篇报道反映了人权观察研究人员 2007 年广泛的调查工作，通常与有关国家的人权积极分子紧密合作。它也反映了我们提倡组的工作，提倡组监视政策发展，努力说服政府和国际机构约束虐待，促进人权。人权观察全年的出版物，包括了此报道中简短总结的问题的更多细节。请看人权观察网站，[www.hrw.org](http://www.hrw.org)。

像过去的年份一样，这篇报道没有包括人权观察工作的所有国家章节，也没有讨论所有重要的问题。没能包括某个国家或问题常是我们缺少人力的反映，而并不是对其重要性的忽视。有很多的违反人权行为，人权观察没有足够的人力去着手调查。

在决定我们 2007 年工作重点（以及这篇报道的内容）时，我们考虑的因素包括影响的人数和虐待的严重性，国家的进入权，能够获得的资料，虐待势力对影响的易受感染程度，讨论某些主题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地方权利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这篇世界报道没有独立章节讨论我们的主题工作，但它把这些内容直接收入到国家条目中。如想了解关于我们在以下方面的工作，请看人权观察网站：儿童权利，妇女权利，武器和军事问题，商业和人权，艾滋病和人权，国际正义，恐怖和反恐怖，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以及同性恋的女性，男性，两性的，变性人的权利，以及我们的国际电影节。

肯尼斯·罗斯是人权观察的执行主任。